

为内蒙古文学创作增添蓬勃力量

『青年作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文学研讨会』发言摘要

◎ 鲍丽丽



编者按

为引导自治区文艺界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安排部署,发现、扶持、培养、宣传我区文学新人,推动自治区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日前,由内蒙古文联主办,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内蒙古作家协会、内蒙古网络文艺家协会共同承办的“青年作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文学研讨会在呼和浩特举行。

来自区内外的专家学者、作家、评论家以及媒体记者等近70人参加会议。

会议集中研讨了安宁、肖睿、牛海坤、娜仁托娅、渡澜、阿塔尔、苏热七位我区优秀青年创作者的作品。他们是我区优秀青年创作者的代表,其中有4位是80后,3位是90后。近年来,他们崭露头角,活跃文坛,有的写作方向是小说、散文,有的是报告文学,有的是多种体裁,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民族文学》《十月》等全国有影响力的期刊,曾获首届华语青年作家

奖、冰心散文奖、中国报告文学征文优秀奖、三毛散文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内蒙古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等诸多奖项,收获累累硕果。

与会专家学者站在不同角度,从创作手法、艺术特色、思想立意及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对七位优秀青年创作者的作品进行深入剖析,总结其创作风格、创作特色与创作成就,指出其创作局限及得失,对青年作者今后的创作将大有裨益。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七位青年创作者认真践行新时代文艺方针和路线,作为中坚力量,他们在内蒙古文学创作队伍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的文体风格和创作方法各有不同,但是内蒙古丰厚的文化积淀、独特的风土人情,以及新时代各族儿女在这片土地上奋进的脚步,都在他们的作品一一展现,极大地丰富了内蒙古文学的创作面貌。

本报摘登部分发言内容,以飨读者。

邰筐(方圆杂志社执行主编):安宁对故乡的描摹是多元的,情感是复杂的。她用文字拥抱了童年的自己,也完成了对昔日那些乡间人物的一一造访。安宁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即“用一本书清洁自己的内心,洗去所有遗落在童年的尘埃”。在《寂静空间》里,她的文字比以前更加节制和隐忍,隽永的抒情里也包含着些许困惑。此时她笔下的故乡已不再是现实里的那个老家,而是独属于她一个人的隐秘世界。

满全(内蒙古作家协会主席、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安宁笔下的乡村是丰满的,也是孤独的存在;是封闭的,也是辽阔的世界;是残缺的,也是完美的记忆。表面上看,她沉迷于童年的乡村生活和乡村风光,其实她一直书写着自己的内心世界。安宁笔下形成了两种乡村世界,一个是以村庄为圆心的乡村世界,是现实的乡村世界;另一个是以远方为圆心的乡村世界,是心灵的乡村世界。前者代表她的现实和肉体,后者代表她的向往和灵魂。

李锐(评论家、作家):勘测人的存在是文学的任务。肖睿的《生生不息》讲述的是人的存在,这足以显示出肖睿是大手笔。这本小说超越了许多同类环保生态小说,高明之处在于他的叙述不是一种写实的陈述,而是一种拟陈述。沙漠是肖睿造访文本的起点,在以往作家看到保护生态和重复历史的地方,肖睿却看到了人内心潜层的风景线和灵魂的地理学。肖睿的成功再一次证明正确的文学理念正在进入新一代作家的视野,并进而指导着他们的创作实践。

赵富荣(内蒙古作家协会秘书长、内蒙古文学馆馆长):肖睿以20年的创作实践,从青春写作走向青年写作,创作出一个个自成一体的世界,这些世界有着强烈的个人标识。在内容题材上,从自我走向更广阔的人群,从校园走向鄂尔多斯高原,寻找自己文学文化地理意义写作的高地;艺术手法上,以人物意识结构故事,新社会现实感的构建以及崇高为美的美学理念都是在不断尝试与内容相匹配的表现手法;在情感的真挚性上,以爱情为途径描写人的命运感,切入人生的实质,以及用鄂尔多斯精神书写英雄主义的旋律,都是以诚挚激情的写作寻找一个人立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兴安(作家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牛海坤的报告文学《额济纳河畔》既有现实的治沙故事,又有历史的沿革,同时还能将额济纳的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这个大的历史背景有机结合。整部报告结构错综复杂,尤其是善于将现实和历史相互交叉,成为故事和叙事的动力。而且她善于将民歌、谚语点缀在文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总体来说,这是一部写得非常到位、内容丰富、感人至深的报告文学,可以说是额济纳河周围的一段历史的记录。

伍金宝(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民族团结教育实践中心负责人、党支部书记):报告文学《生命的守望者》虽然是牛海坤的处女作,但是起点非常高。她非常善于细节描写,所以整部作品的可读性大大提高,同时她的采访也非常深入。为了完成这部作品,她在包头市什佳图矿区采访了一年多,在采访对象家同吃同住,这对一个女作家来说极为不易,她做了一个报告文学作者应该做且必须做的,所以她的作品才有了厚积薄发的力量。文字是她心灵的使者,一字一句都是自然流淌出来的,因此这部作品文字真诚,意境深远。

李旺(内蒙古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综观娜仁托娅的创作,表现出身份、体裁的多栖。作者首先引起关注的是2014年发表在《民族文学》上的散文《柴火垛上的月亮》,用一个孩子的视角表现了人们的生活场景,这也是作者目前最富个人特征的作品。之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追逐太阳的人们》用历史散文的宏大叙述讲述了人们对光明和自由的追求与信仰,对自然的爱,历经苦难而坚韧不拔

的勇敢精神。散文之外,产生过影响的是作者的电影剧本与纪录片创作。作者不仅仅是坐在书斋里的人,还要用身体力行推动事业的成型,这从她热衷于纪录片的摄制可以看出来。纪录片《遗落在亚欧大陆的神器》展现了口弦琴的历史与现实。电影剧本《箭环》《枢》,一部历史剧一部现代剧,可见作者既思考着历史,也思考着现在与未来。

郭锦蓉(内蒙古大学艺术学理论研究生):以“魔幻与童话之间”的故事写作一炮打响的渡澜以作品中丰富的情感、绮丽的想象、令人惊叹的文字张力,引起了文坛的关注。“渡澜现象”提示我们,她所拥有的光彩,一定是我们所缺少的。渡澜有着非线性语言表达和奇特想象,还因为传递一种童真式的悲悯而显得深刻。渡澜的创作思维之所以如此不同,重要的原因在于民俗文化给她带来的持续而不同的养分。渡澜曾说,小时候她经常看到她的奶奶把剩下的饭粒喂给蚂蚁。文明与自然同在,渡澜也决定背靠着自然写作。

谭佳蕊(内蒙古大学文史哲基地本科生):在代表作《傻子乌尼戈消失了》中,渡澜用一种神话性的、感性的、超现实的语言建构了一个少年,这个少年意味着现实世界一切逝去的和作者本人记忆中存在的纯洁、美好和爱,试图召唤那些已经被遗忘甚至被异化但依旧沉淀在人们心底和记忆中的东西:与自然的和谐、美好的人性、质朴的生活……

兴安(作家出版社编辑部主任):我一直在关注着阿塔尔,作为值得期待的新人,阿塔尔的写作难以用惯常的阅读经验去解读,他的出现是对内蒙古小说创作的一个逆反。《雪原战争》是阿塔尔同名长篇的一个章节,但足以让人感到它的复杂性和史诗性写作的雏形。从阿塔尔的作品叙事中,隐约看到了一个“90后”青年试图用自己有限的经验,建造了一个与现实平行的另一种现实。相较小说的内容,阿塔尔对叙述和细节的处理更加吸引读者。小说的叙述非常冷静,谨小慎微,不动声色,但冷静的背后却潜藏着悬念和紧张感。

黑梅(作家、编剧、自由撰稿人):从阿塔尔《倒错的中学时代》中非理性的自省,到《终有一日》里为自己杜撰的终点时刻,阿塔尔在创造体验、试图完善自己精神世界的任何可能,对于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创作者来说,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崔荣(内蒙古大学教授、文学博士):苏热将自己的经验与情感,投入到一个永远也无法走出的,叫做黄镇的地方,构成文本的典型环境,作家以此为据点调动记忆和感知并激发想象和抽象,进行自己文学世界的布局谋篇。这样一种苏热式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指向一种生存经验、生活氛围和生存境遇以及生命色调:阴黄。苏热在写作中对现代主义技法的有效探索,让他的小说带着极强的先锋性。苏热的贡献和创造性还在于,他在创作时实现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有效融合。

安宁(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内蒙古大学副教授):“黄镇”是独属于苏热的文学地理版图,在外部“黄镇”的启示下,苏热建立起一座内心深处隐匿的迷宫一样阴郁的“黄镇”,并因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神秘风格。这种风格让苏热自动摈弃了传统的草原题材,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内蒙古大地的版图。恰恰是这样全新的打开,让他开始重新审视人类生死存亡的价值,审视偶然与必然的关系,审视亘古星辰与席卷沙尘之间的关系,审视哲学之于人类的意义。苏热扎实的哲学功底、对学术研究的热爱形成苏热小说中初具雏形的独属于他的作品气息:神秘、紧张、哲学、阴郁。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提升中华文化的感召力、亲和力、影响力,一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强调并大力倡导的,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殷殷期盼和谆谆嘱托。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讲好中国故事,既是文艺创作的基本功,也是弘扬中国主流价值观、传播真善美的助推器和助燃剂。从传播学角度来看,讲故事是舆论传播的通行方法,也是社会沟通的有效办法,故事是“世界语”,一个好故事胜过千言万语,有助于国际社会对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加深了解。从受众角度而言,讲故事是让人接受的好办法,故事中有哲理、有文化、有味道,一个故事比一打道理更容易打动人,有助中外人民加深理解、相互沟通。近年来,涌现出《攀登者》《红海行动》《大江大河》《山海情》《觉醒年代》《你好,李焕英》等一批反响良好的优秀影视作品,成为用艺术语言讲好中国故事的代表。这些文艺作品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在国际国内文化战略格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时代文艺创作要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着力丰富中国故事的精神内涵。讲好中国故事,关键不仅仅在于描摹中国社会外在的形态面貌,更在于深入挖掘中华民族内在情感、心理、气质、思维方式与价值结构,深切把握中国大地的脉动和心跳。当下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社会体制深刻转型、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

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这些都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资源。广大文艺工作者在这广阔天地施展才华,理应聚焦现实题材,打造文艺精品,不断增进国外民众对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现状的理解与认识,展示新时代中国脱贫攻坚成果,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同时,力避文艺的功利化与模式化倾向,防止无底线地迎合观众,被资本的逻辑绑架,造成故事的低俗化、庸俗化、媚俗化;防止无上限的拔高标准,造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化、格式化、肤浅化解读。

讲好中国故事更应高度重视和发挥媒介传播的功能和作用。文艺本身不具有媒介属性,文艺也只有通过媒介传播才能到达受众。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脑科学等的发展,为文艺大变革大繁荣提供无限可能,催生新的文艺形态和文艺业态。文艺创作不仅要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与变革,更要适应文艺形式和文艺业态的变化与变革,在互联网架构和思维下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精准传播和广泛传播。讲述听得懂、听得清、有共鸣、有实效的好故事,诠释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中国制度的内在合力,是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彰显中国理论的实践价值、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切实增强中外人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认同、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的内在要求。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各民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同努力奋斗

◎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

◎ 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 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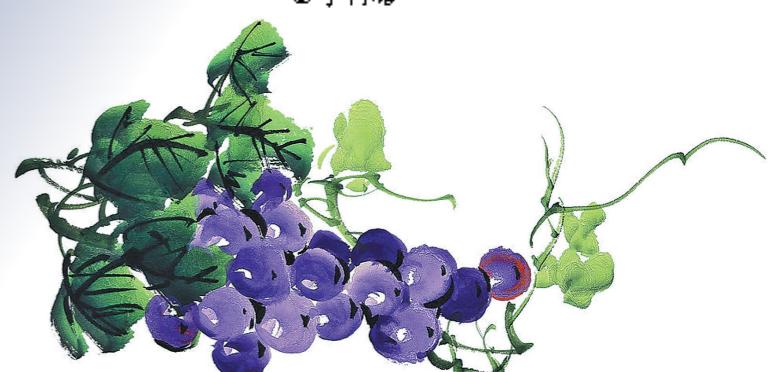
◎ 文艺要赢得人民认可,花拳绣腿不行,投机取巧不行,沽名钓誉不行,自我炒作不行,“大花轿,人抬人”也不行

◎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 文艺批评就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

描绘晶莹剔透的人生模样 ——简评胡春玲“葡萄”画作

◎ 李树榕



葡萄,娇柔、晶莹,出现在胡春玲的画作中,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美妙和神奇。

品味胡春玲数量众多、主题专一的葡萄绘画作品,感受到的是虚实相生、情景交融、耐人寻味的意境。从葡萄的造型可以看出来“只能是葡萄”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的写实性,画一幅是这样,画十幅百幅都是这样;画一年是这样,画二十年都是这样,这需要多么与众不同的想象能力和美学自信啊!

人们都说,画家要飞跃,就要突破自己,而突破自己,就是要突破艺术风格,而突破艺术风格,首先就要突破题材的局限性。胡春玲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放弃葡萄这个题材,尤其不容易的是不放弃“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创作”的以写实为主基调的葡萄题材,终于使自己成了“葡萄仙子”。

如果说,造型的写实性是属于对客观事物的尊重,那么,葡萄呈现出来的色彩,就是胡春玲放飞艺术想象的结晶了。深蓝色的背景上出现了金色的葡萄,虽然有违常理,但黄蓝互补的原理却使之洋溢着高贵之气。淡绿色、淡黄色、淡紫色的背景上分别绘制出深绿色、深黄色、深紫色的葡萄,即使同色差给人优雅之感,但画家要通过造型之实与色彩之虚的艺术反差,营造不同于他人的“意境”,却是显而易见的。而情景交融,却是胡春玲的艺术之所以让人深思之处。无论是架上葡

萄还是盆景葡萄,无论是小品画一般的葡萄还是鸿篇巨制的葡萄,无论是有鸟儿猫儿做陪衬的葡萄还是伴以其他物件的葡萄,只要出现在胡春玲的画作中,每一粒葡萄都晶莹剔透,放射出如同星星一般的光彩,那么纯粹,那么透明。这就令人不禁会想到人生的“品格”或者“品性”。要透明地做人,那是需要勇气需要自信需要事业支撑需要强大的内心的!胡春玲画葡萄一画就是几十年,以葡萄自喻是其潜意识的告白,“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是她执著的追求。

让我更加感动的是胡春玲对绘画艺术的痴迷状态。她说,一日不画便觉心里空空落落,一旦拿起画笔便忘记了一切,废寝忘食。如此,她才可能神思飞扬,落笔不俗,用变化的笔触和色彩绘就人生之春秋。孔老夫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可见,沉迷绘画其中,物我两忘,人画合一,而非追求绘画之外的既得利益,才使胡春玲的画作呈现出令人与众不同的精彩与超凡脱俗的境界!

